

重拾杜聰明精神研討會

我們是這樣走出來的——高雄醫學院創校經過 本校 林永哲教授演講摘要

林永哲教授出身醫生家庭，是本校第一屆學生，特別分享本校筆路藍縷的創校歷程。當年他已考上臺大藥學系，但因父親希望他當醫生，因而報考高醫，當時他與許多同學都是奉父母之命來投靠杜聰明院長。開學典禮在愛國國民小學的大禮堂舉辦，簡單樸素，杜院長致詞時說，在這個簡單樸素的环境，將來會遇到很多的困難與挑戰，期望同學和老師能打拼，而他要奉獻他的生命，創造專門人才與權威教授，來貢獻世界學術之進步及增進人類之福祉。開學日10月16日，對杜院長有重大的意義，是堀內次雄校長任命杜先生為臺北醫專講師的日子。

林教授認為高雄醫學院的成立像一個奇蹟，一般設立學校，從籌備到教育部核准，招生到開學一般來說至少三四年，但是高醫從籌備到完成，三個半月而已。是因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相信杜院長的人格、智慧與能力以及在臺灣醫界及政治界的好聲望，特准高雄醫學院成立。當時也有反對聲浪，如醫學教育制度改革元老劉瑞恆博士寫信給教育部及省政府，認為高醫沒有校舍、儀器、圖書，借用小學講堂為教室，成何體統，揚言要終止醫藥援助，請教育部不可核准招生，結果沒有成功。隔年，仿照臺大醫學院藥理學教室建造的第一棟建築物完工後，他們就搬回自己的校舍。那時建造校舍，是由唐榮鐵工廠捐贈鋼筋，臺灣水泥提供水泥，有人捐錢、紅磚、大王椰子樹，及南部各縣市政府捐贈等。創校三年後，為了臨床醫學訓練，將第二、三棟做為醫院，另外在六合路租一間約兩百床的房間來做門診部。

當時創辦醫學院完全是對社會和弱勢團體的關懷，杜院長希望能夠平衡南北醫學人才的培養，終結離島、山地、偏遠地區的無醫村，至今



高醫已培養約4萬多名專業人才。而當時的教育很重視外國語文和人文素養，要學英文、德文、拉丁文和法文等，德文老師薪水則是杜院長向德國政府募款來支付。暑假期間，杜院長都安排去野外調查，如去花蓮縣秀林鄉調查寄生蟲和墾丁公園採集藥草等等，也將寄生蟲帶回學校做教材。

杜院長特別注重人品教育，用種種教材來教導學生，如因受到蘭大衛醫生割膚之愛故事感動，特別請名畫家李石樵先生作畫，讓學生觀賞和學習，使其將來成為德術兼備且有愛心的醫生。畢業典禮時，杜院長期許畢業生要知道創校的經過，體驗創業的苦楚，要用這樣的精神替社會服務。林永哲教授最後回顧並感慨道，「我今年已八十三歲，從當時入學之初，令人失望的「無」，到畢業時充滿希望的「無限」，無論今昔，縱使獨處都能感受到恩師杜聰明先生的言行、身教影響於我，一步一腳印，落在我心，永遠感恩恩師的教誨。」

重拾杜聰明精神研討會

杜聰明博士以身教為啓發的人文教育 高雄長庚醫院 陳順勝教授演講摘要

陳順勝教授以他自身為例子，分享二十年來收集到高醫創辦人杜聰明的資料與影像，印證杜博士以自身言行來教育與影響學生，證明身教的楷模學習力量，達成醫學人文教育的目的。

陳教授談及醫學人文教育非常重要，但卻困難且抽象，它涵蓋科學、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革領導小組主張「人文教育並非與現實生活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樑。」而杜院長是用身教，來達成醫學人文教育的目的。

陳教授自身蒐集了許多珍貴史料，最多的是剪報，也在十幾年前將高醫文史館內有關杜院長的資料電子化，這是受到杜博士對臺灣醫學史嚴謹研究的影響。剪報部分，他也特別提到在高醫紛紛擾擾20年期間，謝獻臣院長將所有報紙都剪報留存下來，有兩大本，是珍貴資料。雖然報紙的實證（evidence-based）不高，觀點可能受政治影響，但陳教授認為仍可作為基礎，以延伸去查其他證據。

陳教授認為杜院長撰寫的《中西醫學史略》，是至今描寫臺灣醫學和世界醫學連結，最完整的一本書；杜院長也利用這些教材來教導學生，在在都影響了陳教授。但他也強調，對於師長教導內容，要保持實證（evidence-based）的求證態度。比如他到葡萄牙里斯本時，至海事博物館，考察杜院長所提，臺灣史多如此記載之1544年葡萄牙人出航經過臺灣，稱臺灣為Ilha Formosa（美麗之島）的證據。為此，海事博物館協助查找資料後回覆，1542年葡萄牙人就已經過臺灣。

臺灣歷史有文字可考究的約400年，但杜院長對400年前的歷史一樣關注，因此對考古學感



興趣並實地考察，這也影響了陳教授，他現在亦到處考察。另外，每當拜訪原住民時，杜院長總著西裝打領帶，以示對原住民的尊重，因此陳教授每至山上巡迴醫療服務時，也一定打領帶。他另強調到偏鄉地區義診，完全是杜院長的影響，是種奉獻。上山前，他也會透過杜院長對原住民如何思考疾病的記錄，如對蛇的迷信，先做好心理準備，將在平地習慣的治療方式放下。

承繼杜院長對品格教育的重視，陳教授也邀請蘭大弼來高醫。對於何謂成功的醫學教育者，陳教授以蘭大弼醫師為例，在經過數十年後，他身邊的學生仍繼續跟隨他，甚至數量增加。談到高醫本身，杜院長在創校之初，建立校舍時，還自己去看石頭，然後監工、種樹。最後陳教授分享，他一生的榮譽之一就是獲得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

重拾杜聰明精神研討會 從民國55年9月13日的高醫緊急董事會 談高醫的創辦人爭議 輔英科技大學 鄭志敏副教授演講摘要

鄭副教授認為，對高醫人來說，高醫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這個時間點若轉不過，高醫可能會變成世界一流的名校，若轉不過，高醫可能會回到這十、二十年間紛紛擾擾之中，所以目前是重要的階段。他個人與杜聰明先生家沒有淵源，跟陳啓川家族也沒有淵源，跟高醫也沒有淵源，可說是局外人，純粹以歷史學者就歷史事實去論證。

鄭副教授在民國94年，為了學術研究，出版《杜聰明與臺灣醫療史之研究》一書，就已談到民國51年至55年間的高醫風波，但他發現臺灣很少人接觸此問題或僅輕描淡寫帶過。所以他這次以高醫在民國55年9月13日開過一場關係到高醫數十年發展的緊急董事會為例，談創辦人的問題。董事會會議資料來自謝獻臣院長時代編的高醫校史，謝院長不曾評論雙方是非，但卻留下很多討論資料，成為後人研究時的重要資料來源。

從民國51年至55年之間，杜聰明院長和陳啓川董事長兩者之間拔河了三回合。到第三回合，雙方關係緊張，教育部介入協調，以密室協商方式斡旋，兩人同時退位。但根據鄭副教授的研究，協商僅是表面，因謝東閔當時和陳啓川提過，你先這樣做，我承諾保證你一定會滿意。之後於臺北召開緊急董事會，會中杜院長僅說了兩行話：「聰明創辦高雄醫學院十二年，學院建設告一段落，為退讓賢能，謹辭去院長職務」，之後就沒有發言；相對陳啓川說了一大串，並提到用人不明，以至校務不振，弊端叢生等，鄭副教授認為兩人的氣度高下立判。在會議紀錄裡也可看到，時任監察委員的董事陳江山，發言說，「陳董事長所提以洪壽南先生為董事長繼任人選，本人不反對，惟以陳董事長係高雄醫學院創辦人」，這時陳啓川董事長發言，「我不是創辦人，請勿亂說」。

但在之後陳啓川本人和他的子孫把自己說的話推翻掉。民國59年附設醫院落成時，立碑內容就提到「用示對創辦人陳啓川先生令尊中和翁致敬之意」，這時候就開始進行把高醫創辦人從杜聰明變成陳啓川的工程。後續便一步步洗腦，在謝院長卸任時編的三十五年史，



就記載兩位共同創辦，這個共同創辦後來變成高醫人的共同記憶。但在歷史事實的邏輯上，先後次序是杜聰明想要創辦醫學院，在尋地過程中接觸陳啓川，然後陳啓川說要捐這塊地，所以才創辦。且為了補強陳啓川為創辦人的論證，陳啓川先生文教基金會在今年年初出版《高雄醫學院創辦史》，書中提到因杜聰明負責籌備招生手續，所以博得創辦人之美聲，而陳啓川負責董事會監督與募款，因忙碌，錯失並列高雄醫學院創辦人之名，實為令人惋惜之處。但從當時杜聰明申辦高醫時，報給教育廳的公文，事由很清楚為「擬私立高雄醫學院創辦人杜聰明呈送設立高雄醫學院」，這是目前為止談論創辦人之事，最有力的證據。當時私立學校設立，創辦人需擬創辦辦法，包含董事會名單，因此杜聰明就申報陳啓川、徐傍興等人。意即是杜聰明創辦學校後，去請陳啓川做董事和董事長

鄭副教授總結時認為，創辦人原本應該是無爭議的事，卻因人心的貪婪衍生往後的糾紛。加上高醫自身校史的書寫糾雜不清，也造成外界困擾誤解。最後鄭副教授也表示，高醫在追求正義的同時，應關切護理學界的轉型正義，因在臺灣護校時代，也有受到不正義的對待，期許以後大家還有更多共同努力的地方。

重拾杜聰明精神研討會

高醫的大學自治與挑戰

本校 陳正生教授演講摘要

陳正生教授現任本校主任秘書，此次就其這一兩年來參與學校校務，面臨學校創辦人史實釐清及董事會不當干預等等，進行整理報告。高醫正進行所謂大學自治，即教師及學生在學術或教學研究上的自治，不受政府、政黨、宗教或其他勢力（譬如董事會）的干預，所以師生共同參與學校公共事務及重大決策，甚至校長產生的方式，但這目前在高醫遇到很大的挑戰。

在學理上，董事會成員基本上並非大學之成員。私校法第29條規定：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不得擔任校內之行政職務。學者也主張當董事會用其他目的之考量，來干預或變更基於大學自治之自主決定時，就是會侵害大學自治，所謂不當的干預校務。學校校長、師生應要主張可以相對於董事會之大學自治自主決定，來對抗不當的干預。

從私校法來看，第50條提到，附屬機構係以學校為主體申請設立，並為學校所有。而高醫是學校法人，應依教育部私校法，以學校為主體，為興學來設立附屬醫院，此不同於長庚醫院是屬於醫療法人，可由董事會主管醫院。因此高醫董事會，可能是以醫療法人董事會自居，才造成現在很多問題。而依照第29條，若董事會決議未依照其職權下決議，就有可能違反此法條。如高醫董事會於民國83年在學生就醫優待細則，植入「本校創辦人陳啓川之家屬就醫優待…」此條文修正說明也載明董事會職權與學校行政分離，由校長綜理校務，執行董事會決議。但陳教授強調其決議必須依私校法及捐助章程之規定行使職權。

陳教授以附設醫院落成誌更正確碑文為例，說明董事會的干預。在大學法第15條載明，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事項包含組織章程及重要章則，附院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等。而更正確碑文案是經由校務會議之校務代表決議，但執行後，董事會行文給學校，反對學校更正確碑文，認為「未經董事會再次決議變更前，應依原有決議辦理」。

董事會不當干預，也實際影響校務，如高醫董事會因違反私校法第29、50條，以至於教育部扣學校獎補助款總共1500萬。違法事項包括董事會主導附設醫院申辦大同醫院，董事會影響學校行政、醫院採購，未符合私校法捐助章程。監察院報告內提出，因董事會違法，導致教育部扣學校獎補助款，此機制對學校沒幫



助及改善，也不合邏輯，有違公平性，目前學校也正提出訴願。

另項訴願則為學校去年11月修正組織規程，包含1.校長遴選方式依照大學法條文2.副校長之任用方式依大學法，不須經過董事會3.本校設立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改為本校設立附設醫院4.附設醫院院長任用方式，依大學法第16條、36條規定，直接報教育部核定實施，但被教育部退回，認為需經董事會會議，此項也正進行訴願。

陳教授最後也強調學理上，董事會非最高權力機構，北醫李祖德董事和陳玲玉董事也提出，醫界與學界存在捐助人係財團法人兼經營者的謬思，導致捐助人形同永遠不會出賣股票的大股東，可以無限期掌管財團法人的決策與執行，這是積非成是的怪異現象，成為醫院與私立學校的亂源。

陳教授總結道，大學自治的實踐攸關高醫長久發展，也說明近日具體的實踐包含，一、創辦人的更正與後續衍生議題；二、依照大學法與私校法規定組織運作；三、提升校長遴選委員之代表性，但目前面臨的挑戰有主管機關因循泄沓，董事會干預及許多人認為董事會是最高權力的迷思。他最後強調學校法人董事會（Board of Trustees）與公司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本質不同。公司董事會為營利，成員通常擁有股份可決定分配盈餘員工及股東。學校法人董事會則是非營利，無所有權，是監督的，要讓人信賴的。👉

重拾杜聰明精神研討會 高醫與臺灣轉型正義的深化 中研院臺史所 吳叡人副研究員演講摘要

中研院吳叡人副研究員從轉型正義的理論、在臺灣的實踐等介紹起，並說明若將高醫放在轉型正義的脈絡時，應如何理解。吳副研究員提到，他個人專長為臺灣思想史，研究臺灣知識份子在思考什麼，而杜聰明為臺灣第一代的現代型知識份子，幾乎是個原型，杜聰明的出現代表臺灣人在追求現代性上有很重要的進步。而杜聰明被趕出高醫的故事，他從小就聽過，這幾年高醫改革又將此揭露出，可見歷史無法被掩蓋。

吳副研究員專長為轉型正義，多著墨於政治案件，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對於高醫改革，他特別提到一開始未知覺這是轉型正義，比較直接聯想到是私校結構的問題，但因高醫的運動很有原創性的提出轉型正義，刺激他對此議題的深入思考，拓展對轉型正義概念的想像。

他說明轉型正義是國外研究民主轉型的政治及法律學者，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提出來的觀念，意指一個社會從威權獨裁的統治轉型到民主社會的過程，可說是民主化的一環。民主化過程中，全民制憲、總統直選等屬於制度的硬體工程，而轉型正義則為軟體工程，透過清算過去這段歷史，重新確立民主人權價值觀，以達到民主的鞏固。吳副研究員說，臺灣的社會轉型是協商式轉型，是由李登輝收編民進黨，由國民黨裡的本土派來主導民主化。由於協商式轉型的特色為局部和漸進，需付出包容加害者等道德代價。因此臺灣社會有很多殘存的威權獨裁因子，高醫就和這有關。如果當時高醫陳家早一點處理，今天就不一樣。

若把高醫改革放進轉型正義的脈絡，目前轉型正義處理的都是國家層級的政策造成的人權侵害和財產掠奪，但轉型正義浪潮正從國家層級滲透到社會各領域，從中央滲透到地方政治。而高醫改革從兩層面來看，可說是轉型正義的運動，第一：內部治理結構的轉型正義，即戒嚴時代殘留威權治理結構的改造，新一波的校園民主運動。80年代，在黨外運動影響下，臺灣出現校園民主化運動，要求大學自治。那時運動搞到公立、國立大學就停了，所以國立大學大體上大學自治完成到一個階段，但私校問題沒有處理。所以近年來私校問題是和校園未完的民主化有關。私校很複雜，董事



會和校方捐助人和學校經營者的關係，還有董事會和捐助者背後黨國體制的問題，可以說是國家和資本勾結。第二個面向則是國民黨獨裁政權，政治學者稱之為「威權侍從體制」，就是統治體系拿出部分利益與在地勢力進行交換，建立結構性交換關係。也就是說，國民黨對支持其政權的地方勢力用利益交換，然後包庇縱容，由此角度理解高醫，就明白陳家為何如此囂張，將學校納入私產。他坦言未注意到地方勢力介入私立學校經營的問題，而高醫問題把這一塊「掀出來」。而吳副研究員也提到轉型正義不只要改歷史，還有加害結構也要找出來，但因為威權體制下，國民黨有效創造地方基礎，將地方納入共犯結構，這是臺灣目前轉型正義困難進行之處。而這些地方勢力有個特色，沒有很大忠誠心，隨任何黨執政都會忠誠，所以勢力龐根錯節，不管哪個執政黨恐怕都不會主動處理，所以要回到老路，用社會運動施壓。

吳副研究員總結，「高醫轉型正義是歷史性運動，很清楚說明國民黨威權主義殘餘勢力跟價值仍根深蒂固在臺灣。這個運動把過去遺忘的盲點找出來，現在也有了初步成果，監察院糾正教育部算是第一步，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期待有更多同學參與，擴大社會連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高醫透明革命從臺灣南方燒起下一波轉型正義跟民主深化運動。◎

重拾杜聰明精神研討會 從轉型正義看杜聰明精神 民報創辦人 陳永興醫師演講摘要

陳永興醫師首先表示他是以高醫校友身分來分享，而他也是臺灣社會運動參與者，1987年發起二二八平反公義活動。延續吳叡人教授對轉型正義的分享，陳醫師認為轉型正義的面向中，在還原歷史真相部份，大部分都已呈現，社會大眾對二二八事件已有大致輪廓的瞭解。其次，在還給受害者賠償和名譽方面也有所進展，例如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補償條例，政府訂定國定紀念日，以及各地設立紀念碑等。至於第三點追究當事者責任，最為困難。他覺得臺灣的轉型正義太晚開始，現在要追究已經太遲，許多人已經過世，最多就是充當歷史上的裁判。當年國民黨長期執政，共犯結構太多，要追究當事者責任遇到攔阻，十分不易，第四點，關於社會上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或和解共識，以避免再發生此類悲劇，社會如果越加法治和民主，就越不會發生。但如今面對中共新的威脅，這類危機並非絕無可能發生。第五個面向是如何教育下一代，這應大家共同努力。

回頭來看高醫還原歷史真相，大家都在努力澄清被陳家扭曲的歷史，將事實還原，越多人投注澄清歷史，就越容易揭露真相。目前已在進行去除不義的象徵，例如將附設醫院的名稱去除「中和」，將陳中和與陳啓川的銅像移除。追究責任面向，在行政上，則要求監察院糾正教育部，要求其解散董事會；司法上，對陳家提出法律控告，這雖困難，但他有信心，因陳家到如今世襲三代，尚可追究陳家應負起的法律責任。陳醫師感慨的說，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杜院長，今天舉辦這研討會，就是還給杜聰明院長歷史公道，重建杜聰明精神。他強調目前進行之改革，投身私校法修法，符合轉型正義的意義，這不僅幫高醫，也是幫全國許多學校，讓以後學校不再被萬年董事會和家族掌控。尤其目前國內八成學校被家族或財團壟斷，甚至創辦人被竄改。當年國民黨政府為控



制校園，派人佔領私校，如逢甲大學成立初期，教育部次長高信被委派擔任逢甲的董事長，結果高信被當作創辦人。因此高醫非單獨案例，而是反映過去國民黨黨國體制下，致使教育沉淪的情形，而高醫只是受害者之一。

陳家從日治時期開始就和當權者結合，取得特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杜院長和陳啓川發生衝突時，政府的處理。當時教育部出面調解，卻是假象調解，原協調兩方都退，結果調解杜聰明退出，陳啓川又回鍋擔任董事長。到至今陳家三代世襲，甚至連創辦人也要改，連附設醫院也已改成中和，過去教育部包庇陳家，欺騙臺灣最優秀的學者。杜院長離開高醫時，風骨令人敬佩，不出惡言。反觀陳啓川則是多所怨言。

回歸杜聰明精神，可用兩句話形容，杜院長在政權轉移時，承受臺灣人共同苦難，在二二八事件時不得不避難，對國民政府失望。國民黨因仇日心態，在美援後，提倡醫學教育改為美式教育。被拉下台的杜院長，並未放棄，南下創辦高醫。在困難的處境下，杜院長仍堅持醫學教育的理想，並關心原住民專修班教育貢獻，臺灣和高醫都未給杜院長應有的回報，

反而國民黨包庇陳家，高醫多數校友和教職員保持沉默。但陳家惡質到竄改學校歷史，使校友忍無可忍。

陳醫師最後強調，只要大家學習杜聰明精神，面對打擊挫折不妥協，不向黨國政府和財團低頭，維持臺灣學者的尊嚴，高醫的轉型正義一定能成功。只要每一個高醫人身教言教都實踐杜院長精神，高醫現今的董事會不可能存在。高醫成功轉型正義後，就會帶動其他私立學校，進而教育界轉型正義成功，最終促使社會全面轉型正義成功。陳醫師也期許高醫人不可自甘墮落、沒志氣、沒尊嚴，要效法創辦人杜聰明，他未完成的夢，讓高醫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學校，要在我們身上完成。

附件：從臺灣轉型正義重建杜聰明精神

杜聰明先生是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位本土醫學教育家，戰後臺大醫學院第一任院長，更是高雄醫學院創辦人。他的一生橫跨2個不同時代和政權（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政府統治時代），遭遇到臺灣歷史的悲劇（甲午戰爭和228事件），承擔了臺灣人民的苦難和委曲，卻一貫表現出力爭上游出人頭地，堅持學術研究尊嚴的學者風範，他表現出臺灣人的志氣即使在惡劣環境中仍不屈不撓，即使受到當權者打壓仍不放棄打造第一流學府的理想，這樣的杜聰明精神在今天臺灣轉型正義的脈絡下，值得所有臺灣學醫者共同反省和思考。

（一）、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第一：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雙方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清朝出賣割讓給日本，從此成為殖民地，臺灣人民承擔歷史苦難淪為二等國民。杜聰明先生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接受了醫學教育，力爭上游以第一名成績考取總督府醫學校，差點因體格弱小而不被錄取，後發奮圖強勤於鍛鍊身體，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之後不因總督府醫學校僅是小學畢業後就讀五年學歷，立志從事基礎醫學研究，前往日本京都帝大藥理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終於獲得臺灣

人第一位醫學博士，也證明了殖民地小孩出人頭地的實力，轟動了當時日本醫學界和臺灣社會。

（二）、臺灣本土醫學研究領航者：杜聰明先生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台成為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位臺灣人教師，他設立的藥學教室成為培養臺灣學醫者本土研究的搖籃，他的研究注重臺灣本土人民的健康維護，最有名的例如蛇毒研究、鴉片研究、中草藥研究、都是當時臺灣民衆深受其苦或臺灣社會最需改善的問題。杜聰明博士在殖民統治的惡劣環境中，以第一流學術研究的成果維護了臺灣學者的尊嚴，更栽培了無數優秀的學子，打造了臺灣藥理學研究在國際上揚眉吐氣的基礎，他的成就讓統治者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其學術地位。

（三）、時代變遷政權轉移下的苦難承擔：1945年2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臺灣從日本統治下移轉為國民政府接收，交接時期杜聰明先生是當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惟一臺灣人教授，自然成為戰後臺大醫學院首任院長。他在戰爭結束日人撤退，百廢待舉物資欠缺，陳儀政權腐敗貪污，軍紀蕩然社會動亂的惡劣環境下，努力維持臺大醫學院和臺大醫院的安定和重建，也努力培養臺灣本土年輕醫師和學者接替日人遺留的工作，但是國民政府的仇日心態與貪污腐敗的統治和杜聰明的學者風格無法相容甚至有所衝突，在1947年228事件爆發時，杜聰明不得不為了避難而躲藏，他丟掉了臺大醫學院院長職位，但更不幸的是他目睹了臺大同事遇難和臺灣社會菁英慘遭大屠殺和大逮捕的命運。作為臺灣人最出名的學者，他和大多數的臺灣人民一樣，在時代變遷政權轉移中承擔了臺灣社會的苦難，後來更因當權者接受美援主張放棄日式醫學教育，杜聰明不得不離開了臺大醫學院。

（四）、不忘打造第一流學府創辦高醫的理想：杜聰明離開臺大是人生重大的挫折也是臺灣醫學界的一大損失，但是他沒有放棄要為臺

灣打造第一流學府的理想，他南下高雄尋求有志者，希望在臺灣創辦一所第一流的私立醫學校，他的心目中很多世界第一流的大學都是私立的，所以他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並沒有讓他放棄為臺灣醫學教育奉獻的理想。在重重困難的條件下，杜聰明終於克服萬難，在眾多臺灣醫界、社會人士、地方士紳的支持下，創辦了高雄醫學院，從一片荒地借用國小教室開始招生，杜聰明為南部臺灣紮下臺灣醫界教育的新芽，他仍堅持「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為培養第一流醫學生在荒漠中勤奮耕耘，甚至為照顧臺灣最弱勢的原住民，高雄醫學院首創開辦原住民醫師專修班，為臺灣的偏鄉醫療播下無數種子，如今高醫校友遍佈各地，為臺灣社會作出美好的服務，但在杜聰明博士在高醫的奉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五)、被當權者打壓仍堅持學者尊嚴：杜聰明校長也是高醫的創辦人，在當初尋求各界協助要創辦高雄醫學院時，經人介紹高雄大地主陳啓川，當時陳啓川以捐地為名，獲得杜聰明博士邀請為第一屆董事並被聘為董事長，從此高醫埋下日後紛爭的伏筆。原來陳啓川號稱捐地其實是要放領給佃農的土地（當時國民政府推行375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杜聰明校長發現之後只能無奈的以高醫學校經費，向佃農取得土地始得興建高雄醫學院，從此以後陳啓川掌控高醫董事會排除原有社會各界賢達和捐助者，高醫董事會成為陳家三代世襲主導的董事會，董事會介入學校和附設醫院的財務人事，以致爆發了杜聰明校長和陳啓川董事長的不和，驚動當時教育部出面調解，後來勸退雙方，由魏火曜接任校長並由洪壽南出任董事長。結果是教育部包庇了陳啓川家族，杜聰明信守承諾離開了自己辛苦打造的高雄醫學院，從此不再過問高醫的事也不口出怨言，維持他一貫的學者風範；但是陳啓川離開高醫之後，只讓洪壽南作了短暫的董事長，他就又回鍋擔任董事長，迄今陳啓川家族已三代世襲董事長掌控高醫董事會一甲子。更不可原諒是陳家董事會竟然行文教育部要求更改創辦人為陳啓

川，更把高醫附設醫院改名為中和紀念醫院（用來紀念陳啓川父親陳中和），陳家三代違法亂紀在高醫倒行逆施的種種不當作為，教育部長期包庇縱容，已被監察院調查屬實而予以糾正（如附件）。陳家所以能霸佔高雄醫學院，完全是依附統治者與當權者結合成為惡勢力。

(六)、臺灣轉型正義脈絡下的杜聰明精神：在威權時代和不同政權下，受到打壓而承擔苦難默默犧牲的杜聰明，始終堅持作一個有志氣的臺灣學醫者，他力爭上游出人頭地成為臺灣第一個醫學博士，領航臺灣醫學本土研究和教育，栽培無數臺灣優秀學子造福臺灣社會，在時代變遷和政權轉移中，他和臺灣人民同樣承擔了苦難付出代價，之後仍不改初衷為打造臺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而奔波奉獻，沒想到他遇上了南臺灣大地主陳啓川奪取高雄醫學院，陳家三代與當權者結合政商關係勢力無法阻擋，杜聰明成了威權體制下的犧牲者。但他保持了臺灣人的志氣和尊嚴，不向惡勢力和當權者低頭，堅持作第一流臺灣學者的風骨，他的奮鬥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值得後代學醫者省思和學習，而臺灣轉型正義的推動者更應還原歷史真相，還給杜聰明歷史公道和榮譽，而對陳家不公不義竊佔高醫的舉動也應給予歷史批判和責任追究，要重新打造高醫成為第一流學府，發揚杜聰明精神，是我們在紀念杜聰明和推動臺灣轉型正義時，要共同努力完成的課題。📖

附件：

糾正案全文下載網頁

<https://www.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24458>



調查報告下載網頁

<https://www.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24457>



重拾杜聰明精神研討會

杜聰明精神灌溉的透明革命

林子盟醫師演講摘要

林子盟醫師以「杜聰明精神灌溉的透明革命」為題，分享杜聰明精神是追求自由，在這個暑假，他特別到杜院長母校京都大學，看到校園圍牆上寫著員警禁止進入，立即感受到這個校園的自由性。兩年前，京都大學爆發反安倍的抗爭，有學生因此被逮捕。員警穿著便衣進入校園想要搜證卻被學生發現，遭監禁審問為何偷偷進來大學，接著副校長也加入了審問的行列。因為不管是教授還是學生都相信大學是自由的，不能被外界干涉。

這暑假，他也到柏克萊大學訪問，這間擁有高度學術地位的學校，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站在最自由的一面，站在最威權的對立面。60年代時，因越戰反戰及黑人民權運動的開展，他們的學生在校園內外爆發抗議。他們相信自由平等是一個普世的價值，而學校學術會議也通過支持言論自由。對於追求自由的價值，在高醫校內許多主管也同樣積極捍衛。

對於私立學校是否為私產的議題，林醫師引楊朝祥部長之言，「學校雖然有公私之分，但對學生來說並沒差，這個財產捐出來之後，就不再所屬個人。」而如同陳正生教授補充，學校的董事會為 Board of Trustees，公司董事會則是 Board of Directors，完全是不同性質的東西。他並舉透明革命時和董事會的互動為例說明。比如當學生提議說能否公開會議記錄，讓他們相信董事會是合法的，董事會回覆「沒有問題。我們採取穩健、公開、透明。但是我們是合法的。你的意見我會帶回去看看。」但現在董事會網站上，無法看到任何會議記錄。甚至發現董事會發函學校，要校方就校內學生活動



及教師連署事件參與的師生妥為處理，而妥為處理是白色恐怖時期才會有的用詞。

因此他們在廣場辦系列演講，學生們點蠟燭，說出自己對母校的期待。由於現今私校是遍佈在全臺灣的政黨結構所造成的結果，因此他們當時也齊聚許多私立學校，包含東海大學、世新大學、輔仁大學、慈濟大學等及教師團體，到立法院申訴。林醫師將高醫改革定義為轉型正義，這個學生運動，不只是僅限於改革自己學校的董事會，而是要拓展出去，希望通過私校法來修正，讓全臺灣私校可以重生。

最後林醫師也激動的提到，6年前他剛到高醫時，聆聽林永哲教授及鄧哲明教授在臺上講杜聰明的精神，而他也上過陳瑩霖教授的高醫經典人與事，現在他則自己在臺上分享。他認為高醫很重要一點就是傳承，傳承杜聰明精神。最後他以「杜聰明大道通向的是自由（路）」，做結尾。📍